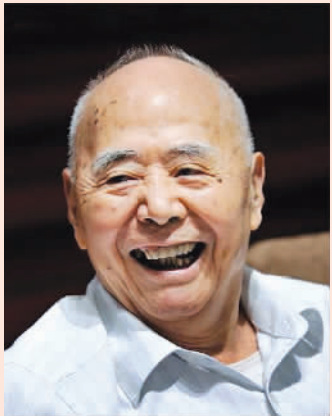


大师



编者按:今年是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诞辰105周年。钱先生于1952年加入民盟,曾任民盟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主任委员。本期特别刊发倪文尖教授最新撰写的文章《钱谷融文学批评的两大关键词》,以此缅怀先生。

钱谷融先生是公认的文学批评大家,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上,先生的成就、贡献学界也早有公论。作为有幸跟从先生学习的弟子中的一员,在此我想从自己的聆教心得出发,以凝练关键词的方式,表达对导师学术为人的深心体悟,以缅怀钱先生,也求教于方家。

“人”

第一个关键词是“人”。钱先生盛年的成名作是《论“文学是人学”》,假借高尔基的有关说法为支援,以超

越同侪和时代的理论勇气,鲜亮地提出了文学艺术的“人学”主张,甚至不妨说是发明了“人学”这一概念。这让先生受累半生,也为他赢得了一世的英名。我是在先生“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年纪入门读博的,这期间,钱先生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编了一本自选集《艺术·人·真诚》(本文中钱先生相关著述的引文,皆出自该书,为行文方便一律不注)。我忘不了先生题词送我书时是那么高兴,更记得自己见到书名这五个字时的激动,尤其是人,大写的“人”字居于正中,这象征化地表明,钱先生到了晚年,对他一生的信仰还愈益坚定,愈益自觉。

这信仰既是对于“人”的,也是对于文学的。钱谷融先生理解的“人”,确实是“大写的人”。这是源自启蒙主义思潮里的“人”,是五四时期在中国成为强音的“人的文学”里的“人”,是“个人主义的人文本位主义”传统里的“人”。这是理性的人、自由的人、个性的人。“把人当做人,对自己来说,就意味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别人来说,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所以,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积极的方面说,就是要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争取民主。在消极方面说,就是要反对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就是要反对不把劳动人民当做人的专制与奴役制度。”钱先生如是说,这对“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所处的社会,也显然是更高的期许。而到了80年代,先生可以比较从容地阐明立场了,通过答友人问的方式,他更言

简意赅地概括自己的文学观,是“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

只要是真读过署名为钱谷融的文章,都会被先生通情达理的循循善诱所感染、所感动。因为,钱先生有坚固的“主义”观点,但那绝不是教条,而是活生生化成了自由出入于文学经典的批评方法、阅读方法。钱先生的理论和方法一点也不高冷、抽象,甚至也没那么高大上,因为钱先生的天性,与其说是哲学的,毋宁说是文学的。先生对人的信心和信仰,应该是出自对古今中外文学传统的熟稔和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钱先生心目中的“人”,甚至就是文学名著中的那些经典人物形象,以及创造了他们的伟大作家。“伟大”不是高大全,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像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是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也是崇高与渺小的统一,是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搏斗,而且归根到底,一定是前者战胜了后者。因为,人是文学的出发点,而文学又自有带动人心、也带动人类向上的神奇力量,这是先生“文学是人学”论的根本,这是“人”之所以为第一个关键词的原因,也是理由。“文学作品本来主要就是表现人的悲欢离合的感情,表现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对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叹、不平的”,“在文艺创作中,一切都是以具体的感性的形式出现的,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

“中国式心理分析”

这就说到了第二个关键词。这一位置的竞争显然异常激烈,比如上文的“真诚”和“诗意”,再比如众所周

知的“美”“细读”“散淡”“文学的魅力”等,但思前想后,我认定是“中国式心理分析”。

所谓“中国式心理分析”,另有一套东方的智慧作为底层逻辑。老话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也就是把人当人看,把人看作正常人、平常人、凡俗之人,把人放到日常的世俗生活里观察分析,不回避常识,反而更尊重常识,在承认也尊重人的“小心思”“弯弯绕”的基础上,正视每个人心底的曲折及其是非曲直。而其方法论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有人一律平视,既不高看那些大人物,也不轻视一般的小人物,从行为举止和习惯里看人识人,既以己度人,也以人观己,既从人情世故里体察世道人心,也从世道人心的高度来观照具体而微的世俗和人心。

这当然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而一旦落实到学术研究,就是一双能够洞察文本深度的慧眼。钱先生的《《雷雨》人物谈》是中国式心理分析的典范之作,不仅在专业内将文学批评中的“人物论”写作提升到了难以企及的境界,而且在专业外,这本书和其研究对象《雷雨》一起成了经典,书里的许多观点成了常识而广为流传。比如,对周朴园的分析,“一个人对于已经失去的东西,总是特别觉得可贵,特别感到恋念的。尤其是他做了那样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总不能毫无内疚。现在,侍萍既已死去,对他就不再有什么威胁、不利,他就更容易想到她的种种可爱处而不胜怀念起来。这种怀念,又因他的灵魂的内疚,又因他的补过赎罪之心而愈益增加了它

的重量,以至他自己都为这种‘真诚的’怀念所感动了。他觉得自己虽然‘荒唐’于前,却能‘补过’于后,就仿佛也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了。这样,他对侍萍的怀念就做得愈益认真起来,并且还以此自豪,以此来教育周萍,来树立家庭的榜样”,一层又一层,关键的逻辑环节都诉诸普通读者的人情常理,并在其参与和认可中不断推进,而格外让人惊奇的是——当这么一个周朴园知道侍萍并没有死,且就站在面前时,他却忽然严厉地喝问侍萍“你来干什么?”——钱先生对此的分析:“他首先考虑的,总是自己的名誉、地位,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并不损害他的利益时,他是可以有一点感情的,但当他一发觉这种感情与他的利益相抵触,将要危及他的名誉、地位时,他就会立刻翻脸不认人,把这种感情一脚踢开”,同样是人情入理,而且是同一种逻辑贯穿到底,非但使这一戏剧突转一点也不突然,而且由此聚焦,把周朴园“这一个”人物的复杂性、深刻性揭示得入木三分,不能不让人赞叹钱先生把中国式心理分析这武器锻造得威力无比,并且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中国式心理分析看起来对传统“心性之学”多有承继,也确乎特别注重对“人心”的深入剖析,但从根本上讲,这种论述方式却并不“唯心”,倒反而是非常“唯物”的。其一,我们一直说的是“人心”,而不是“人性”,“人性”很可能本质化、固化,而人心是活的、变化的;其二,“人心”如果有秘密,那也并非什么深层心理、藏在心底,而却实在是人对各种关系、各种得失的盘算,因此,不

是“一个秘密”,而是“各种盘算”,不取决于“深度”,而取决于“关系”;其三,所谓“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各种盘算”,归根到底不外乎利益,而“利益”,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但归根到底无疑都还是物质性的。就此而言,钱先生的“人”,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意义上的“人”,这才是受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的主要表现。

也因此,在这个角度上,对于近年来的一些新说法、新认识,比如认为钱谷融的文艺思想,尤其是当年的问题出发点与基本思路,是内在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逻辑和运作机制的,我持基本赞同的态度。虽然内在性与异质性的关系还需进一步具体化,论述的分寸感也有待拿捏得更准确,但无论如何,钱先生的“文学是人学”思想和中国式心理分析的方法不能再被简单化地理解了。对于这个问题,从最低限度上说,钱柯所谓“权力不仅是压迫性的,也是生产性的”相关理论,是很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的。

我不敢确定,这份也算是给先生上交的作业是否有点滴新意,尤其我不敢确定,先生对我提出来的两大关键词以为然否,但我还是要拿先生的话来为自己壮胆:不必太过追新,首先要真,然后要深,真了,深了,自然就新了。其实“真”也何其难矣,但我努力过了,而“深”则寄望于来者了,因为这点确信还是有的:我所说的“人”和“中国式心理分析”,也是今后研究钱谷融先生及其文学批评所绕不过的话题。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钩 沉

民盟女性律政先驱——从史良到韩学章

● 周 忆

在民盟的灿烂星河中,有两位女性熠熠生辉,在中国律政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她们就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司法部部长史良和上海律师协会首任会长韩学章。

锋芒初露

1900年3月27日,史良出生于江苏常州城内观子巷一户书香之家,父亲史子游是私塾先生。在父亲的影响下,她很早就萌发了民主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小学毕业后,史良考入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至常州,史良立即行动起来,她以学生会会长的身份,与武进县立男子师范和省立第五中学的学生代表联系,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副会长和评议部主任,具体负责执行三校学生联合会的各项决议。此外,史良还以常州学生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支援北京学生的集会。关于史良在五四运动时期的表现,她当年的同学回忆说,“史良思想进步,敢说敢闯,对问题的反映敏感性强,说话做事爽快,像个男同志”。

1912年1月5日,韩学章出生于北京的一户梨园家庭,其父亲曾是京剧武生。1921年韩学章随父迁往上海生活。韩学章的父母为人耿直,乐善好施,这样的家庭环境造就了韩学章倔强好胜、耿直豪爽的性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19岁的韩学章作为上海市中学生推举的七个代表之一,带领3000名中学生赴南京请愿抗日。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天寒地冻,负责后勤保障的韩学章面对既没带棉衣也没带钱的中学生,日夜筹衣筹食,使请愿活动一直持续到蒋介石被迫出来面对学生并答应抗日为止。此时,对祖国深刻的爱已镌刻在韩学章的骨血里。

职业选择

1922年7月,史良从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进入上海女子政法学校、上海政法大学(后更名为上海政法学院)和上海法科大学(后更名为上海法学院)学习,开始学的是政治,后转学法律。毕业后,史良于1931年在上海正式执业,开始了她的律师生涯,不久就加入了上海律师公会,随即当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史良在接受《妇女生活》的采访时谈及为什么学法律:“我曾经看见多少被陷害的有着革命意志的青年,弄得有冤无处诉,他们没有钱,没处请律师,我便感到不妨在这方面试一试,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韩学章就读的中学的校长曾说过,韩学章既有文艺天分又有正直的性格,无论是从事艺术还是法律之路都很合适,不过法律之路比文艺之路更长更苦。然而,韩学章还是选择了法律。1934年,韩学章进入上海法学院法律系学习,1938年毕业,1939年正式开始律师执业。

仗义执言

史良从事律师工作后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中国革命互济会”,并被聘任为互济会律师。自

此,史良与中国共产党渐行渐近,逐渐成长为党的忠实盟友。193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遭到敌人的极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革命者及其他爱国人士被捕、杀害。史良为营救政治犯奋不顾身、全力以赴,以法庭辩护方式先后营救出艾芜、邓中夏、熊瑾玎、任白戈等共产党员和革命者。

史良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关心同情底层民众,把帮助别人排忧解难引为乐事。史良谈及她办案的情况时说,“单来找我的,有时为了他们的贫穷,我可以不拿公费,还要贴掉杂费和当事人的住旅馆钱,当然不能做生意的净图利,有时替贫困的当事人争得了胜利,心里真比什么都快活。”

韩学章的职业素养也极为出色。1947年,国民党当局强迫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联合日报》停刊,韩学章以报社常年法律顾问身份出庭与国民党当局代表对簿公堂,虽然最终败诉,但韩学章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有力驳斥,赢得了“民主律师”的称号。

韩学章也曾办理过多位知名女性的案件,帮助女性维护合法权益,如顾兰君离婚案等。梁实秋的夫人韩菁清也曾委托韩学章代理案件。1946年上海小姐选举比赛中,韩菁清因相貌出众遭到许多地痞流氓的骚扰,韩学章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决定站出来帮助韩菁清。她不但通过法律帮助韩菁清维护合法权益,还公开登报斥责那些地痞流氓的行径。

抗日救亡

“九一八”事变后,史良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与上海妇女界的爱国人士一起筹备妇女界救国会。1935年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在四川路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人员千余人。大会推选史良、何香凝等七人为主席团成员,史良任主席。会后,史良带领与会妇女出发游行,高呼抗日口号,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沿途陆续参加游行者达万余人,有力地推动了上海救亡运动的发展。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史良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之一,参加领导上海市的抗日救亡运动。

救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为进一步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秘密举行成立大会。史良作为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代表参加大会,并被推举为常务委员。救国会以鲜明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敌视。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七人同时被捕,即著名的“七君子事件”。通过在法庭的激昂,各界的声援,1939年2月,在重庆的史良、沈钧儒等人收到了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的《撤回起诉理由书》,历史最终判决救国无罪。

韩学章在大学期间就参加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五一”“五四”“五卅”“九一八”和“一二·八”等纪念日游行活动,并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

会机关报《救亡情报》的编委,采访革命前辈。1937年上海沦陷后,韩学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团体中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许广平的组织下筹集资金救济难民。同时,韩学章充分发挥文艺天赋,参加话剧《娜拉》义演活动,演出的票房收入用于创办八所女工夜校,这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妇女干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韩学章不甘在日伪政府的统治下当“汉奸律师”,与丈夫一起摘下了事务所的铭牌,歇业改行当了教师,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才恢复执业律师的身份。1945年,韩学章经史良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上海律师公会最后一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

新的春天

史良是新中国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首任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通过法律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人民服务,是史良毕生的志愿。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史良将建立和健全司法机构的工作机制作为其在任的首要工作。在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史良提倡各地除设立刑事和民事法庭(或审判委员会)外,还应建立并健全值日制、问事处、法医检验等制度和机构,以便民众诉讼。此后,史良根据工作实践,进一步提出人民法院应设立接待室,解答当事人的疑难问题和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便于听取群众的意见,改进司法工作。根据她的指示,各级人民法院逐步建立了人民巡回法庭、人民接待室和人民调解委员会。1951年9月,史良参与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颁布施行,史良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如独立审判原则、审判公开原则、人民陪审员制度以及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等在条例中均有所体现。

史良同时重视建立和完善人民律师的工作制度。在1956年全国律师工作座谈会上,史良对新中国律师的性质和任务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她精心构筑的律师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后,韩学章投身上海的法治建设,她先后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法院婚姻庭庭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庭庭长等。1979年,上海市律师协会正式恢复建立,韩学章任上海市律师协会首任会长,同时还担任第一届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直到逝世前,她还是上海市律师协会的名誉会长。在律师协会筹备初期,韩学章一边积极宣传律师制度,一边制定《上海市法律顾问处工作细则》,这是上海律师制度恢复后对律师工作首次建章立制。

1997年,韩学章逝世后,上海市律师协会召开理事会,决定设立“韩学章律师基金会”,用于奖励在律师工作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同人,资助有关法律事业发展的重点项目。

史良和韩学章用自己一生的实践充分诠释了女性的力量、律师的操守,为新中国法治建设和律师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作者系民盟市委参政议政理论与史实研究会会员、上海长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民盟教育大家频出,他们心系天下,为国育英,不仅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还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思想。民盟的创建者、第一任主席黄炎培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参与创办并由他担任首任校长的浦东中学,开办于1907年,位于浦东六里桥畔,是一所曾蜚声海内外的百年名校。作为浦东地区的第一所中学,曾享有“北南开,南浦东”之盛誉,也被著名教育家吕型伟称之为“中国近代教育的一座宝库”。学校人才辈出,亦和很多民盟盟员结下了不解之缘。

携手建校

清朝末年,积贫积弱的中华大地苦难深重,无数仁人志士希望通过兴办近代教育强国富民,沪上建筑业巨擘杨斯盛因营救从事革命活动的黄炎培而与之为结为莫逆之交。深知黄炎培人品和学识的杨斯盛热心公益,一直想与黄炎培共同以教育救国,他倾其所有,于1905年将家产的三分之二(计30万两白银)献出,在浦东购地64亩,筹建浦东中学。1906年,杨斯盛请黄炎培主持筹建浦东中学,并担任首任监督(校长)。据黄炎培回忆:“浦东中学校舍由我设计草图,杨斯盛先生以专家资格亲自督工,学校布局,错落有致,中间是最高伟坚实的大礼堂,可容千人以上座位,东西各建匡字型的两层楼,楼上楼下各容几十间教室(内含实验室、宿舍、办公室)。两个匡字型向大礼堂对抱着。一边是小学,一边是中学,容量较大。后边两座饭堂,再后面是风雨操场。礼堂前是很大的运动场,设有各种运动器具。”多年以后,黄炎培在《八十年来的》一书中赞道:“像杨先生真是毁家兴学,一切为了教育,为了学生,而一丝一毫不为个人立名。”为了表达对杨公的敬意,黄炎培在浦东中学的月薪仅为40元,而当时中学校长月薪标准为100元。

弦歌不辍

万事开头难,首任校长的治校理念对学校的定位和走向至关重要。1907年至1910年期间,黄炎培担任浦东中学首任监督(即校长),1907~1927年期间,他又担任学校校董达20年。他在办学时既有十分明确的为国育才、德智体并重的指导思想,又有一系列的具体要求和措施,如严格遴选师资,重视校风校风的培养,革新学课程等,这些终于成就了一代历史名校。

黄炎培先生在《八十年来的》中回忆说:“我和伯初(作者注:即时任江苏省民政司总务科长的张志敬,解放后为上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

是直接受杨先生委托的。各科教师,由我严格选聘。”此后历任校长,皆十分重视师资选聘。

民国时期,一些优秀的民盟盟员因机缘际会,走入这座校园成为教师,年轻的他们用道德文章传道授业解惑,并带领学生思索“中国往何处去、用所学所长救国救民”这些问题。在浦东中学,他们教学相长,以后都成为各行各业学有专长,颇负盛名的大学教授和民盟各级领导人。

这些盟员教师,从事文史类教育的有教育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冯素陶,在这里他传真知良识,布革命正道,鼓励学子们为国家 and 民族而读书而奋斗。著名作家、教育家、文学评论家许杰也曾在这里为学生畅谈经史子集。国学底蕴深厚的他对学生所提问题对答如流,以后陆续至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及华东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历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市作协会长等。理化类教师则有细菌学研究专家,曾任福建省立医学院院长、福建医学院(现福建医科大学)院长等职的黄震亚;著名物理学家张开圻也曾在这里的一方讲台上播撒科学的种子,后来他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装帧艺术开拓者、著名篆刻书画家钱君匋亦曾在校内任教,教授传统书画印技艺。

桃李天下

百年间,浦东中学与时俱进,为国家培育了众多的栋梁之材,这其中就有许多后来成为民盟盟员的学生。他们不忘母校的培养,牢记“勤朴”之校训,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学者、行业翘楚,专业精湛并深具家国情怀,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不同时期的盟员杰出校友大致有20余位。

潘序伦是最早在这里求学的民盟盟员之一,品质兼优的他在这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专攻现代财会专业的他后来成为国内最著名的会计学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他相继创办了立信会计学校和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成立全国第一个会计学会——上海会计学会和解放后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海会计师事务所等。关于潘序伦在校的经历,还有一段坎坷:1908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浦东中学,1911年(清宣统三年)他卷入因抗议某教师批分校严而举行的交白卷风潮,被开除学籍。但他后来的学习、生活多受黄炎培照顾,双方情谊甚笃。后来他还专门为学校

第十四届毕业纪念题字“继续努力”。

20世纪20年代是浦东中学产生盟员校友最多的时期,比如操震球是我国实践教育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先驱者;何如是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南京大学法语专业创始人,曾获“法国教育部棕榈教育勋章”,被尊称为“中国古典诗词外译的一代宗师”;李鸿寿是著名会计学家,审计学家,我国成人财经教育的先驱和领导人之一,曾任民盟中央委员,还担任过立信会计学校副校长、校长等职。

20世纪30年代校友董申保,是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中科院院士。他是我国变质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1995年荣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2007年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著名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叶君健是唯一用世界语进行创作并获得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曾任民盟中央常委。

另外黄炎培先生之子黄竞武、黄大能也是校友。经济学家黄竞武是黄炎培次子,曾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中,任金融机构的他誓死揭露国民党将黄金偷运去台湾的恶行,促成部分黄金留在了上海,为新生的共和国留下了宝贵的建设资金。被捕后他坚贞不屈,壮烈牺牲。黄大能作为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领导制订了我国第一部水泥国家标准,是我国水泥混凝土材料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在50年代培养走出了国宝级琵琶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刘德海,曾任民盟中央常委。他曾获中国第一届金唱片奖,首开琵琶大型协奏曲之先河,是与西方交响乐团合作的民族音乐第一人。

浦东中学与民盟的各方面联系还很多,民盟贤贤阁行知、刘王立明等曾在学校大礼堂发表演讲,著名画家刘海粟曾为学校毕业纪念刊专门作画……解放后,已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黄炎培在繁忙工作之余,始终关心着浦东中学的发展。1959年5月7日,他亲笔信函母校,询问复校浦东六里桥原址后的办学情况,并附寄两箱校史材料,心系故地,情真意切。斯人虽逝,风范长存,黄炎培和盟员先贤在学校里的往事都被编入了《黄炎培传略》等学校校本教材中,学校里也一直都有盟员,目前学校有4名在职盟员,他们正在为新时代传承黄炎培等先贤的教育思想而努力前行。

(作者系民盟市委研究室干部)